

强军时代的文学突围

□王龙 牟静娴

纵观中国军事文学史,每逢军队建设发展的重大关头,军队作家勇于发出时代先声,前瞻探索军队未来,深刻思考重大命题,成为军事变革的“时代书记员”。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其调整之深、转型之难、任务之重,实所罕见。在这场气吞山河的伟大行军中,身处改革强军洪流的军队作家,谁能敏锐预判、率先转型,谁就能抢占创作的制高点。这无疑对作家自身的历史感、判断力和预见性,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

新时代的强军文学在转型中重塑、在挑战中突破,涌现出一批描绘强军历程、反映时代变革的佳作,为强军兴军征程留下了鲜活的文学注脚。纵观近年创作实践,无论在创作主体、书写对象,还是叙事内容、审美范式上均呈现出全新特质。面对这一蓬勃发展的文学现象,学界亟须构建系统深刻的理论阐释。

近年来,一批新生代军旅作家伴随改革强军一路成长,与前辈作家在成长背景、知识储备和审美取向形成了鲜明的代际区隔。正如评论家傅强谈及其审美新质时所说,他们“由突出经验到侧重体验,由反映生活到想象存在,由追求宏大主题到凸显思辨深度”,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叙事经验。

改革强军“在场感”

新时代军旅作家群体呈现出一种改革强军“在场感”的美学追求。王凯的《荒野步枪手》在代际对话中完成战斗精神的传递,董夏青青的《在阿吾斯奇》将边关叙事升华为心灵史诗,刘笑伟的《岁月青铜》以冷峻而热烈的意象书写家国情怀。作为新生代军旅作家的代表,他们笔下的军旅生活,具象而沉实、细腻且绵密,传递出一种小中见大、推窗见海的深刻力量,展现了一个变革时代的巨大情感张力。

如果说上世纪末的代表性军事文学作品《突出重围》,讲述的是人民军队跨越机械化与信息化门槛时的艰难爬坡,那么,今天这支军队正处于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关键时期。从水下无人集群到空中智能蜂群,从陆航突击到网络对抗,一支支新质作战力量正在重塑演训场的面貌;中国军人的身影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远海护航、国际维和、人道救援的舞台上。这些强军成就,亟须通过文学形式向祖国和人民报告,凝聚起强国强军的磅礴力量。

相比于过去几十年“农家军歌”与“将门子弟”两类书写模式,新时代我军官兵成分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少官兵拥有多军种经历、多岗位锻炼,新型高素质人群像日益凸显:陆战先锋、海空雄鹰、深潜兵王、砺剑尖兵、特战勇士……强军文学需要镌刻他们的铮铮风骨与时代风华。

一批紧贴使命、聚焦战位的作品,进一步丰富了新时代官兵的形象谱系。陶宏的《射击队》以射击集训队为缩影,用“靶场里的较量”隐喻新时代军事训练的专业化转型,呈现老兵与新兵在技艺传承中的碰撞与融合;廖汝耕的短篇小说《金头盔》,通过“金头盔”得主焦前进在空战训练中不断升级、自我加压的成长历程,展示了空军官兵挑战自我、磨砺意志的时代风采。在报告文学领域,《雕刻时光的导弹兵王》《留学“猎人学校”》《中国兵棋:走向战场》等作品则直击军士长、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等关键方阵,以纪实之笔书写强军征程中的先锋群像。这些作品紧跟只争朝夕的强军征程,追逐冲锋陷阵的铁甲兵车,书写的是新军旅生活,塑造的是新军人形象,更加富有战斗格调,更加充满战斗气息。

把握改革强军中的“变”与“不变”

“知人论世”的前提是要“先知其世”。强军文学若不洞悉改革强军这场伟大变革的内部机理,不能理解强军事业的战略逻辑,现实历程和精神嬗变,就极有可能陷入“刻舟求剑”的陈俗、“盲人摸象”的片面,甚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僵化落伍。前所未有的强军伟业,呼唤着与之匹配的艺术突破。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幅气势恢宏、内涵深厚的时代长卷,唯有全面理解顶层谋划的大设计、转型跨越的大思路、建军治军的大方略,全面把握改革进程中的整

- 新时代的强军文学在转型中重塑、在挑战中突破,涌现出一批描绘强军历程、反映时代变革的佳作,为强军兴军征程留下了鲜活的文学注脚
- 新时代强军文学需要深刻把握改革强军中“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叙事笔法兼具“微距镜头”与“广角镜头”,审美追求从“反映经验”跃升至“思辨深度”,才能为强军兴军注入更强劲的文化动能、创造新时代文学交响的英雄诗篇

编组建、调整移防、换装升级、实战演训、正风肃纪等关键环节,才能准确反映这场整体性、革命性的大变革原貌。

尤其需要看到,改革进程中的“进退去留”、战训理念中的新旧转换、军人价值的磨合统一,这些变化并不是简单的背景板,恰恰是塑造新时代官兵的关键环节。强军文学需要深刻把握改革强军中“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强军征程中,变的是体制编制,不变的是忠诚信仰;变的是武器装备,不变的是血性胆魄;变的是战争形态,不变的是胜战之道。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风云如何变幻,人民军队的本色不变、战力不衰、样子不改。

以《中国作家》2024年第8期“军旅题材小说专辑”收入的中短篇小说《本命》《寻找一只羊》《孤山口站》为例,这三篇作品分别围绕二次入伍、新装备打靶、转隶移防等主题展开创作,是与“强军进行时”高度契合的军营写真。李骏的长篇小说《时刻准备着》以野战医疗所驻训为切口,将“部队卫勤”向“卫勤部队”的转型命题,浓缩为一场野战实战训练与一系列观念碰撞,在叙事中自然揭示“为何改、怎样改”的时代逻辑;陶宏的中篇小说《转隶》,通过旅政委钟正涛在部队转隶前后的心路历程,讲述几代军人对老营盘的留恋、对新使命的担当,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忠诚奉献之歌。这些作品以及时生动的笔触,为改革强军留见证、为人民军队塑形象,堪为“强军进行时”的文学报告,让新时代官兵的形象跃然纸上。

我们要清醒看到,与风雷激荡的强军事业相比,与催人奋进的强军鼓点相比,中锋正笔刻画强军转型的时代力作,目前仍然显得十分稀缺。究其原因,部分作品对改革强军的宏大进程把握不够全面准确,对当代军人的精神世界体悟不够真实深切,创作观念需进一步更新,创作手法亦需升级换代。

在宏大叙事中看见具体的“人”

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考验着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定力、担当与韧劲。无数官兵直面个人与集体、当下与长远、现实与未来之间的利益抉择。因此,强军文学的叙事必须兼具“微距镜头”与“广角镜头”:不仅要书写转型重塑中那些最辉煌的蜕变,更要聚焦利益调整带来的变革阵痛与个体升华,在宏大叙事中看见一个具体的“人”。

强军文学正以更锐利的笔锋直抵练兵备战一线,以充盈的时代质感与滚烫的真实细节,捕捉强军大潮的深层脉动。高满航的火箭军题材小说的写作

令人耳目一新。《远远的天边有座山》等作品在揭开火箭军神秘面纱的同时,以多维度的文字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新时代官兵“我无名国有名,以无名铸威名”的舍身坚守和铁血担当。周鸣的《航母故事》聚焦“辽宁舰”,细腻描摹女军人在高科技装备前的生存状态与内心波澜。吴飞亚的《反对票》等作品立足基层连队,精准捕捉“00后”官兵的鲜活特质。在报告文学领域,黄传会的《站在辽宁舰的甲板上》具有强烈的“征途感”。作品紧扣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现实脉搏,及时反映新装备、新人物、新思想,全方位展现了强军兴军背景下的海军风貌。

需要注意的是,细节化并不等于碎片化,碎片化的真实也不等于整体的真实。强军文学的细节应当在具体之中见宏大,在日常之中显精微。因此,作家既要深入军营一线捕捉真实细节,更要在细节背后把握主观的真实、客观的真实、本质的真实。

俄乌冲突、美国及以色列与伊朗间的军事对抗,已清晰展现出信息主导、算法博弈、无人集群作战等智能化战争的典型样态。然而,当前我国文学作品多停留于装备与场景的浅层摹写,未能触及智能化战争催生的深层伦理命题。

新时代强军文学的审美正从“反映经验”跃升至“思辨深度”。西元的《命运来信》做了一次大胆的思维实验——让一位战略学教授在智能化战争的推演中陷入认知危机,从而逼问出一个根本性问题:当机器能够计算一切的时候,人的信仰、意志和不可替代的坚守,是否才是战争最后的底牌?这种“精神预演”,恰恰是强军文学面向未来的独特价值。

随着战争形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战斗精神正面临双重挑战:军人既要承受远超以往的心理高压,又要在认知层面重构对“勇敢”的诠释。强军文学必须通过对未来战场的前瞻性想象,激发官兵“谋战的自觉、敢战的勇气和胜战的信心”。作家描写对象不再局限于现实硝烟,而是深入“模拟战场”,赋予战斗精神新的时代内涵。曹效生的《新概念战争·220》浸润着革新创造的科学基因与人文思考,描绘跨越领域、地域、时间与形态的战争场景,展现战争的多维性与复杂性,提供了更具深度与广度的战争想象空间。

铸剑为文,文以铸剑。新时代军事文艺工作者当以超迈蓬勃的气象、雄阔凌云的壮志,勇担使命、奋楫争先,以精品力作凝聚强军意志,以热血篇章砥砺战斗精神,为强军兴军注入更强劲的文化动能,谱写新时代文学交响的英雄诗篇!

(王龙系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影视部作家、编剧,牟静娴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学员)

评论

“我的族群,有时候是石头变的,有时候又是流水。”

长篇小说《闪亮的星河》中的第一个句子就吸引了我。在这个句子中,有神秘,有诗性,有古老的传说意味,还自然而然地引发猜度:这样的故事将会如何进行下去?它会一直处在童话式的幻想中还是选择落回现实?从一个章节到另一个章节,从《南木萨》到《银色老鹰》,读完最后一节《领春木》的时候,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还是非常强烈。这部小说始终处在一种奇妙的“未完成”状态。我说的“未完成”不是它没有写完,而是预留的空白点和这些空白的延展让人着迷,让人遐想,让人愿意沿着星光闪烁的河流一路走下去。

或许是一种神秘的缘分,在读到《闪亮的星河》之前不久,我受领中国作协的驻村任务,来到了德宏州。半个多月的时间,我在芒市、瑞丽、梁河、盈江等深入采访,走进德昂族、景颇族、傣族、傈僳族、阿昌族的村寨……那是我得以了解云南“直过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最为直接、最为深入的一个时段。我不止一次地想,这样的故事何等新颖,何等不同,若是能将它厚重地写下来,该有多好。

然后,我读到了《闪亮的星河》。因为有德宏驻村的经历,我在阅读它的时候很有亲切感。我觉得,作者写下的的大抵是我想要的——尽管他写的不是德宏也不是我走访过的那些民族,但具有大抵相似的历史和相似的境遇——这段历史太值得作家来书写了。

在我接触那些直过民族并和他们深度交流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原有的知识体系或许有“失效”之处。我们需要在这一“殊相”中重新审视新旧文明、新旧理念交融的可能,重新审视它们之间的冲突性和内在的化解之道。

这是何等的重要。段爱松应该注意到了新旧文明的冲突在那个历史时期的云南土地上所呈现的殊异性。他大约也注意到,当新旧两种不同文明理念在大目标上呈现一致,新文明是在尊重、理解旧有文明的基础上全力帮助,让旧有文明获得提升、富足、便捷和尊重的时,它们完全可以形成某种合力。

作家有意识地将小说主人公设定为未来时态的南木萨,而主人公的父亲,则是当下现实的南木萨。“南木萨”一词,除了本义“通灵者”之外,还兼具传统文化继承者与阐释者的深层内涵。作家想要塑造的,不只是情节层面的故事张力,更意在借这一身份,承载思想观念与价值立场的内在冲突。在《银色老鹰》一节中,一架极具象征寓意的飞机掠过担当力卡山,带给身为南木萨的“我”强烈的心灵震撼,也恰好印证了人物在理念、认知与生命感知上的内在矛盾。这显然是作者刻意的艺术安排。文本中,诸如此类的意象佐证比比皆是。用现代性思维言说和审视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段爱松寻到的一个极具创意性的母题。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段爱松的《闪亮的星河》又可被视为主题创作,它歌颂解放与付出、建设和帮扶,谱写了一曲牺牲、奉献与感恩的赞歌。我理解段爱松在小说中的真诚赞颂,这与我在德宏州五县的深入采访有关。我了解了旧时这些少数民族民众所过的生活,也知道了现在他们心里的获得感。

段爱松以讲故事的方式,巧妙地将其内心表达出来。《闪亮的星河》采取的是“箱体结构”的办法,故事与故事之间有明显的连脉,核心的人物以及区域构架不做调整,但具有一定的成长性。每个章节,都是一个可以单独成立、具有短篇小说式“精妙美感”的箱体部分,在局部完成自恰。这种方法在赫拉巴尔的《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君特·格拉斯的

《铁皮鼓》中得到过运用。这种结构的好处是让每一段文字都始终具有诗性和张力,始终有合理的矛盾和矛盾的解决,始终有着短篇小说般的吸引力。同时,它又具备整体性,众多的箱体叠在一起,组成一座有独立房间也能相互沟通的“宫殿”。它有效地解决了长篇小说叙事疲惫的问题,给读者留出更多的停滞和喘息空间。

《闪亮的星河》大约属于“小长篇”的范畴,它的篇幅不大,但其中的丰富性却不容忽视。

小说描摹了地域自然风物、民族风情与世俗日常。这些内容都被自然妥帖地融入叙事,在情节推进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真切可感的生活质感与独特的异域风貌。民族历史、原始信仰与传统文化内涵,同样不着痕迹地融入故事肌理。除此之外,文本还容纳了宏大历史、战争事件、文明遗存,以及共和国进程里边疆治理工作开展的史料样貌,这些内容都依托故事情节巧妙融合、浑然呈现。

很多作家写作的时间足够长之后,往往会产生一种写作一本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的念想,试图在一部书中有更多容纳,有意拒绝单一向度。必须承认,作为写作者,我极为赞赏作家们的这一雄心 and 理想化的追求,它应是卓越作家的“必要诉求”,然而,在写作的过程中力有不逮和舍本逐末的居多。段爱松的《闪亮的星河》,在如此短的篇幅中有效地解决了多重展示且故事统一的难题,带给我启示与教益。

评论的目的是索引,是让读者将目光注意于他即将翻开的这本书,让读者在阅读之前尽可能生出“先期的热情”和耐心,完整的揭秘是不必要的。是故,尽管我在《闪亮的星河》中读出的还有很多,但不准备全部说出。我相信,真诚的读者看到的会比我说出的更多,更深,甚至更透。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省作协副主席)

——评段爱松长篇小说《闪亮的星河》

□李浩

一架有寓意的飞机

飞过担当力卡山

懦弱,有恐惧。我们需要陪伴,需要勇气,也需要爱。它们构成了人类存在的理由,也构成了连亨笔下那些容易被遗忘和忽略的人的生命坚实的底色。正如加缪所言:“只要有一丝温情尚在,绝望就不至于吞噬人心。”连亨在颠沛流离的命运背后,以仁爱之心建构了一个隐秘、悲悯而伟大的世界。《网中人》的结尾写二伯:“他没有被命运困在网中,一只残损的手从河中捞起了鱼。”这也是书中诸多人物让人难以忘怀的地方。我们在梦境中看到自身的需要,并反观现实,于是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我是父亲的太阳,那他不是那只驮着我前进的金乌?”那么,谁又能说太阳鸟没有实现我们的愿望呢?它既游荡在那片高远的天空上,也深深扎根在我们脚下的土地里。我们最终找到了它,并发觉它其实从没离开我们的生活。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级编辑)

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寻找到那只金乌

——读连亨散文集《个人史与太阳鸟》

□王承明

近似于个人史自述的文学作品,其实并不罕见。作家回望个人之历史时,大多已暮年。青年作家的写作,大抵也离不开追溯过去的经历,可倘若连续成“史”,却总不免令人担心有失厚重与沉淀。

连亨的《个人史与太阳鸟》用极具灵性的文字和精妙的哲思,书写了她的成长地,也书写了她和熟悉的人们心中绚烂的江湖。她尝试用叙事追寻失落的、面目模糊的来处,建构起属于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精神档案。这当中既有属于纪传体的“附近”的人们,又有属于编年体的时间脉络。她在后记里写到,创作的动机始于一场大病,“唯有写作,才能对抗些许流逝,留住些许我所珍惜的事物”。和专注于自我生活回顾的个人史不同,连亨的作品潜藏着一一种介于梦境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也暗含在她的书名里,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沿铁轨追寻太

阳鸟》一文,细致描绘了“太阳鸟”这一意象的来龙去脉。它是父亲口中神话里的金乌,也是“我”想象里在后羿射日中失却了九个兄弟姊妹的、胆小忧伤的孩子。“我”祈求它免去自己在冬天捡柴火的烦恼,也恳请它带走那场残忍的瓢泼大雨。“我”是唯一见过它的人,在腾飞的火苗里,在日出的天际线,在炽热的阳光下,向着铁道的尽头飞翔。

“我”曾与父亲分享过这个秘密,但他从没见过太阳鸟。它更像是高悬在个人史所构筑的时空上的明媚瑰丽的幻象。我们需要依靠这样的幻象更好地生活下去。或许是太多困顿和悲伤快要将人压垮,所以要努力抬起头看;或许是求而不得,所以要继续走向前。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太阳鸟从未真正降临在我们栖居的现实里。正如《梦里山川》一文所言:“我总是梦想养一匹马,但从未想过养一头牛……二十多个春秋过去了,

我只养过牛,却从未拥有过一匹马。这是生活对人开的玩笑,也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真相。”又或者,当我们以为要触碰到太阳鸟的羽翼时,它却扑动翅膀飞走了,变幻成另外的模样,就像《车站》里所写:“我兜兜转转,想要找到一双最好的鞋,但任何一双鞋都经不起太远的路,我只好一直不停地寻找。”

是的,现实常常以无常的面貌出现,流露出悲伤甚至残忍的神情,连亨没有粉饰这一点。她的笔下,有被无情的河流带走的孩童,有生活在孩子离世阴影中的父母,有失去了丈夫的疯女人达佳。有卑微,有偏爱,有憎恨,有生离死别,有世事难料。以和现实同样冷峻的语调去言说,某种程度上,人的痛苦成就了文学的质地。但连亨的高明之处在于,并未一味像深入沼泽般陷入苦痛的泥潭,而是展现出了造化弄人的境遇之中人性的光辉与闪耀。《孤舟上的

人》写男孩阿松傍晚在河里失踪了,大舅带着搜寻队沿河去找。阿松的父亲和大舅有过节,可是当父亲哭着说不找了,大舅却坚定地说,肯定找得到。紧接着,连亨写到大舅的往事。原来,他的女儿也曾被那河流卷走了。这是一个有关无常的故事,河流的循环或许是命运残酷的圈套,可故事最令人回味的地方并非圈套本身,而是人与人之间超越了简单的爱恨情仇、悲喜贪嗔的复杂情感,它有着毛茸茸的质感,像线球一样缠绕并勾连我们的心灵,却使人在悸动过后感到一种深深的平静与慈悲。而这,正是我认为文学有别于其他魅力的所在。

合上书后,我不由得想到一个问题:“个人史”与“太阳鸟”,究竟哪个更贴近真实?正如高飞的太阳鸟总需要枝头去停靠,梦境也总有它赖以生长的土壤。我们的想象根植于大地,也根植于那些人性深处最根本的需要。我们有孤独,有